

从**官场**到民间
从向**总理**上书到向**百姓**言说



我向百姓

李昌平◎著

说实话

农民代言人李昌平

远方 YUAN FANG

继《我向总理说实话》后又推力作

我向百姓 说实话

李昌平◎著

从官场到民间
从向总理上书到向百姓言说

遠東 YUAN DO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向百姓说实话 / 李昌平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

社, 2003.11

ISBN 7-80595-908-0

I. 我… II. 李… III. ①农业经济—中国—文集

②农村经济—中国—文集 ③农民—问题—中国—文集

IV. ① F32-53 ② D422.6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第 105261 号

我向百姓说实话

李昌平 / 著

策划编辑: 徐 晓

责任编辑: 陈莎莎

文字编辑: 安 琪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 远方出版社

社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编: 010010

发行: 新华书店 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010-64959556)

印刷: 北京市黄坎印刷厂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2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08-0/I.345

定价: 2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序)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 吴 象

2000年3月8日，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朱镕基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像闪电划破黑夜长空时的一声惊雷，在中南海引起了震动。朱总理两次批复，派工作组下乡调查。

后来，他把事件始末写成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村问题老专家杜润生在书的序言中说：“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身份，系统提出、以数据说话、以亲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话有震撼力，“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了社会广泛流传的名言，使“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时代的呼唤，成为全国上下严重关注的一大焦点；使那些只见城市高楼大厦、不见农村大量撂荒，一味追求GDP增长、不问收入分配真情，对经济的繁荣发展沾沾自喜、对存在的困难矛盾视若无睹的人，也不能不开始清醒：“三农”问题不是

一句“工农、城乡、地区之间还存在差别”这样轻描淡写的话，附在一系列辉煌成就之后一笔带过，就可以向人民交待的了，而是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解决。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提出目前已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不全面的。这是党中央实事求是的表现。我理解，全面小康应当是全民共享的小康，至少应当是走向全民共享的小康，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全国相当大范围还是现实的时候，怎么谈得上全国已经实现小康了呢？

最近两年李昌平又写了不少文章，坚持不懈地继续探讨“三农”问题。不久前，他到我家送来一叠复印的稿子，请我看后写几句话。我一篇一篇读了，总的感觉是他不愧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是经济学硕士，在农村基层一线工作了17年，来《改革》杂志任记者、编辑后，仍不断下乡调查研究，在丰富的实践体会的基础上，拓宽了宏观的视野，自然会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尽管有些观点、判断、剖析，尚不无可商榷之处，但都可引人深思，使人得益。对我来说，主要是提高了对“三农”问题严重性、紧迫性的认识，启发最大的有三点：

一、尽快扭转工农、城乡差距加速度扩大的趋势。谁都知道，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缩小差距，才能达到共同富裕。80年代前期，工农、城乡差距有所缩小，随后又变成逐步扩大，而且越到后来越呈加速度扩大之势。李昌平说，1987年农民每亩负担需100斤粮食；到1990年，农民每亩负担70元，折合粮食250斤/亩；到1999年，这个数字升为150元，折合粮食300斤/亩；到1998年，这个数字又升为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问题的严

重性在于，进入 90 年代以后，对乡镇企业的乱收费开始泛滥，直接间接造成农民收入下降，尽管 1994、1995、1996 三年粮食涨价，也未能扭转局面。1997 年起，中西部广大农村，普遍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带给农民一点有限的实惠已经消耗殆尽，荡然无存。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口号不断高喊，实际上是负担不断加重，收入不断减少。现在数量可观的农民，不怕饿肚，最怕生病。温饱基本解决，小康差距尚大。

据中部五省调查，有 42% 的农民无力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33.4% 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读完法定的九年书，64% 的农民借有外债。我国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在缴纳税费之后的剩余，难以维持家庭的简单再生产；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劳务收入 10 年来没有增长，人均劳务收入不增反减，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工资，难以维持本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状况如何能继续下去？李昌平说：“中国农民是中国的政治生态，当我们破坏生态，生态会作出自我调整，最大限度地承受和化解‘痛苦’，我们一时感受不到生态的报复。但生态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脆弱的生态将爆发毁灭性的报复。”这句话应引起高度的警惕。

二、基层政府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直接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村凋敝、各种矛盾加剧的局面只有愈演愈烈，永无宁日。1985 年前，乡一级党政机关人员一般不超过 20 人，90 年代以后，逐渐增到 100 人以上。镇财税所原来只有 3 人左右，后来财税所分为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后来税务所又分为国税所与地税所，有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上百。目前，全国县乡两级吃财政饭的约 32 003 人（不含

村干部），县、乡、村三级每年至少需要4 000亿元（包括工资，部门运转经费，村干部、军烈属、五保户补贴，债务利息，农村公共品安排等五项）才能维持合法生存。而从农民身上合法征收约800亿元，从工商税收分成约500亿元，资源补偿收入约200亿元，收支相差2 700亿元。因此只有非法“创收”才能维持生存。

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好的税源和税收上收了，县里多数只留下些“包袱”。中西部绝大多数县一级财政保吃饭、保运转、保稳定都有巨大缺口，只有转嫁到底层。全国乡镇一级卖掉了能卖的一切，还欠债约2 300亿元（中财委调查数据）。每年要靠非法加重农民负担数千亿元才能维持生存；全国村级基本上卖掉了荒山、荒水外，还欠债2 500亿元，靠侵占农民出让土地权及其他非法收入400亿元维持生存。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对农村的政策在贯彻执行中必然被扭曲，解决“三农”问题的资源被层层截留，政府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执行职能过程中，往往部门利益高于人民利益，而且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来压农民。农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基层政府、部门“靠权吃民”已成普遍现象。中央三令五申精简机构，基层各种名目的编外人员却不断膨胀。基层政府体制内人员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和农民利益相对立的食利阶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变为“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因此，乡镇政府已成为推行村民自治的最大障碍。这是农村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最主要的突出的矛盾，不仅是少数人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问题，更重要的是体制、制度的问题。惩治少数严重违法的犯罪分子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问题，必

须反思政策上体制上制度上的原因，下决心从根本上对基层政府和部门进行改革，继续推行村民自治，总结四川步云乡的经验，逐步实行乡一级的直接选举。明确基层政府、部门任务，以任务定编制，超编人员享受下岗工人待遇，积极帮助他们创造再就业机会，把他们由非生产人员变为生产人员。同时重新定位乡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保证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建立公共财政，加强民众对财政的监督管理。

三、变恶性互动、恶性循环为良性互动、良性循环。“三农”问题的根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歧视农民的思想观念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民名为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只是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廉价农产品的提供者，在就业、户籍、福利、社会保障各方面一直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声音却是微弱的、分散的、难以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但是歧视农民的思想、二元分割的结构还在发挥作用，财政、金融、税收各方面的政策无不深受其影响。这就是9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工农、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一直叫喊减轻农民负担反而负担加重、一直叫喊增加农民收入反而收入减少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再任其积累不加解决，就会加剧新旧体制磨擦，加强旧体制的惯性力量，出现“体制胶着”状态，导致改革旷日持久，拉长转型过程，引起不确定的风险。

李昌平说，增加农民收入是一把打开通向稳步发展之门的金钥匙。增加农民收入——农民购买力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民转移加快（实现有序转移）——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这样的结果是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稳定发

展。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制度性问题，农民负担只有增加不能减少，“三农”问题就会转化为城市问题，出现另一种循环：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民向城市涌入——城市经济社会恶化、城市就业岗位减少、城市工潮爆发——农民收入进一步下降。这样的结果是城乡恶性互动、经济疲软，社会动荡。两条道路，两种互动，两种循环，两种结果。

如果算总账、算平面账，我们现在已实现小康甚至超过，农村实现小康的在沿海发达地区也可以找到不少，外国人和城里人得到的表面印象确实是很好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恶性互动的路上走出来，摆脱恶性循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并未过时，前面不远就是农村破产的万丈深渊。许多关心“三农”问题的学者、专家不断发出呼吁，加快体制、制度改革，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千方百计出谋划策，开通城乡分割的壁垒，落实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小康应当是全民共享的小康，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又是这条必由之路的入口。

今年三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宣告，要把“三农”问题摆到全党工作（不仅仅是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进行城乡统筹的战略调整，这表现了高层领导最清醒的认识和最坚强的决心，使人们有了新的希望。我们相信，战胜“非典”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之后，国家将逐步采取重大举措，正需要更多的情况调查和政策建议。李昌平的新书出版，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是为序。

2003年9月

从《我向总理说实话》到 《我向百姓说实话》(自序)

2000年3月给朱总理的一封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2000年9月遗憾地辞职南下，到广东打工，2001年9月又北上来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打工。不当干部了，开始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了四平八稳的心态，没有了优越感。现在习惯了，觉得打工还真不错，没有了“明知故犯”的侥幸，没有了“一票否决”的压力，没有了“左右逢源”的无奈，没有了“装腔作势”的跋扈……

离开乡镇工作岗位后，特别是到北京后，我发现很多搞三农问题研究的人其实不是很了解三农，我想我应该写一些东西，给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人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于是《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01年1月问世了。它在国内外产生的巨大反响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向总理说实话》打动了无数人，不仅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或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那些已经成为城市人甚至几代进了城的人，他们的感动也丝毫不亚于农民。很多读者是流着

泪水连夜读完我的书的，不少朋友一边读，一边哭着给我打电话，问我他们能为农民做些什么。

《我向总理说实话》改变了无数人的观念。很多生活在城里的人，并不知道农村的情况。他们原以为，城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想当然地认为农村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我向总理说实话》中，他们感悟到了城市繁荣背后的东西，开始关注他们视线以外的农村。他们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感谢李先生，你让我们明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我向总理说实话》与众多的朋友产生了共鸣，书中很多故事和数据成为他们研究成果的佐证。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看了我的书，开始将自己的研究与现实中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我向总理说实话》搅得许多人心神不宁，我所知道的以《我向总理说实话》“说事”的就有一百多个学者。

焦国标先生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舆论界曾经形成过两个话语中心，一个是右派平反，一个是老干部昭雪。《我向总理说实话》铺遍大江南北后，“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成为第三个话语中心”，中国农民受难者形象为更多人所知。现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从业者都在向我们的农民爹娘献孝心；从普通人到国家领导人，都在关心“三农”了。

《我向总理说实话》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这些批判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在众多批判和评论中，代表之作要数西乌拉帕的《李昌平为什么失败？》。

西乌拉帕将我和张德安进行比较。张德安是四川省仁寿县谢安乡人。1992年11月至1993年3月，张德安带领谢安乡新民村村民自发学习、宣传中央的农村政策和法规，依法抵制县政府征收“213”国道建设摊派款，经过团结、勇敢、艰苦的持续斗争，最终胜利推翻了县政府的不合理摊派，农民负担

因此大大减轻，持续10年处于全县最低水平；政府还拨专款21万元为当地群众修建大桥一座。西乌拉帕认为：受过高等教育、身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在棋盘乡开展改革，面对强大的地方势力，最终不得不出走。李昌平失败了。张德安是一个普通农民，面对地方官员的强大势力，他依靠团结农民兄弟同强势利益集团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最终否定了地方政府的决定，维护了农民的权益。张德安胜利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结果呢？

西乌拉帕进一步分析说，李昌平作为乡党委书记，对农民有的只不过是同情心而已，他缺乏张德安那种对农民自身力量的自信心，李昌平潜意识中把自己定位于为农民谋幸福的精英，自己是在为民呐喊——是自己带给农民幸福！总之，在李昌平眼里，农民可怜、农民需要同情、农民无能，农民只能被动地等待自己去救去解放。李昌平没有、也不可能像农民张德安那样带领群众自发学习中央文件和有关法规，更不可能冒着坐牢甚至生命危险去与上级地方政府斗智斗勇、辗转周旋。李昌平虽然有胆给总理写信，虽然也丢得起乌纱帽，但他却不敢发动群众。所以，他的行为是有明确底线的，他与那些孤立他、怨恨他的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说得难听一些，他们是穿连裆裤的，至少李昌平没有勇气撕破这条裤子。

西乌拉帕得出结论：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什么良心、正义感、下跪、乞求、流泪……所有这些，根本不能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博弈的力量。要改变命运，9亿农民惟有靠自身的团结、勇气、智慧去努力争取。一切将农民的意愿弃置不顾或将农民排斥在外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案，都不会取得成功。

《我向总理说实话》的面世，在改变着他人的同时，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将我同中国的“三农”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的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了“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甚至提到李昌平这个名字，人们就自然想到“三农”。

《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后，我的信件多了起来，由每天的五六封到现在的三十多封；电话多了起来，由每天的十来个到现在的五十多个；来访的人多了起来，由每天的三五人，到现在的二十多人。在来信、来电话、来访的人中，不仅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战士、学生，还有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内外专家和退休的老同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让我和数以百计的乡镇干部成为好朋友。

我每天都要用3个多小时的时间接待来访的人，我只能接待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中国改革杂志社请了一名律师代我全天候地接待。那些千里迢迢来北京上访的人，他们向我诉说他们的冤屈，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但更多的人只是说给我听听，只是想见到我。我仔细地倾听每一个上访者的诉说，劝慰他们受屈的身心，这是我惟一能做的。他们中间90%的人我是无力给予帮助的，当我告诉他们我无能为力，并希望他们不要上访，希望他们“记忆过去，藏在心里，面向未来，从新开始”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很失望，临走时还是流着泪握着我的手，感激地对我说：李编辑，你是惟一一位认真倾听完我们诉说的干部，你多保重啊！每当上访者失望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的心里特别无奈和难过。

北京的火车南站，是进北京上访者最集中的一个地方，上访的人称之为“上访村”，那里成为进北京上访人的家。我的

心常常连着北京的火车南站。那里有3~5元住一晚的“旅馆”，夏天，住不起“旅馆”的人就栖身在树林里，不少人为了躲避蚊虫的叮咬，不得不在身上盖厚厚的一层沙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访村”看望一个人，误入他们的“掩体区”，踩着了几个上访者，把我吓得半死。

在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老上访户，靠“打工”或乞讨来维持他们的上访，时间最长的达42年。很多上访者想回去，但他们回不去了，耽心回去后受到打击报复。我所知道的因为上访而坐牢的农民不下百人，被北京的地方便衣警察抓回家拘留的就更多了。很多人走上终身上访之路。在我认识的上访人中，想回家而怕受到打击报复的，我都给当地的乡长书记写信和打电话，希望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善待他们，并且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很感激那些给我“面子”的乡村干部，我们由此成为好朋友了。河北的一位曾经给了我“面子”的乡党委书记在我的办公室里对我说：老李啊！现在的“刁民”这么多，动不动就到北京来告状，有些问题我们乡干部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乡干部难当啊！这苦水只有跟你吐啊！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来到了北京还得靠下面解决，下面又说解决不了，长此下去该如何是好！

上访的人虽然无助，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能很快融入上访村，能很快团结起来。2002年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很晚了，我突然接到上访村打来的一个电话，有一个人要求见我，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事和我商量，要我马上去他指定的地点，那语气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和我见面的有三个人，都是“上访村”的人。他们急切地告诉我，将在后天举行“万人罢访大游行”，以抗议信访部门的不作为。他们说，学生可以罢课，工人可以罢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罢访！我大惊

失色，转而伤心落泪。我对他们说：来北京上访的人，都是一些无助的可怜人，都是一些有冤在身的穷苦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当家人，你们不能带这些人走上绝路啊！

“上访村”常常引发我很多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了两千多部法律，农村乡一级有了法庭，但上访的人却越来越多了，我们依法治国怎么治理出这么多不得不依靠“上访”——非法之法来解决的冤情啊！问题出在哪里呢？上访的人多了，但现在通过上访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民间的冤屈到哪里去申啊？！上访本来是合法的，但很多地方动不动就对上访者采取拘留、关押、判刑的非常手段。法呀，就像一个魔方，这会不会造成上访者走极端呢？无数的上访者，为捍卫100元的权利，却要付出10000元的代价，逼得很多受害者成为肇事者，维权者成为违法者，这是不是上访者维权过程中的恐怖主义行为的重要原因呢？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尊重弱者的权利，让我们来一次和解运动吧！”

我每天要用大量的时间处理来信和来电。多数的来信和来电都是因为看了《我向总理说实话》后，希望和我交流或向我反映情况。中国改革杂志社同样安排有专人帮我处理信件和电话，但还是处理不过来。有时处理一封信也会花去好多天的时间。去年夏天，我收到福建南平一所师范学校一个农村学生的来信，信中说他的父亲开着农用车在上坡时与迎面而来的公安车相撞，明明是公安酒后开车并违章驾驶，可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他父亲违章还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名学生全家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公道可言，有理无处说。他在信的最后说：当我收到他的信时，他的全家可能都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世界。接到这样的信，是很难受和很难处理的。好在我曾经报道过“南平经验”，和南平市的主要领导比较熟悉，情况迅速反馈到南平，

南平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与校方取得联系，在多方的努力下，及时地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南平的这一起事件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但更多的事没有得到处理。在我每天见到的弱勢者中，遭受掌握公权者欺负的还是比较多见，甚至有不少法官也公权私用。面对公权的私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靠“人”来纠正。假如普通的老百姓有能力纠正公权的私用，问题比较好解决。但大量的公权私用要靠很少的有更大权力的领导来纠正，这种机会太少了，弱者付出的成本也太高了。

在河南的一个乡中学，有一个农民的孩子失手把乡长的孩子打成轻微伤，乡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这个不满16岁的农民孩子送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这个孩子的生殖器被人割了。而且，这个农民的孩子在讨回公道的路上耗费了全家人三年的时间 and 家里所有的家当，他的姐姐在为弟弟讨公道的过程中遭人暗算也付出了无价的代价。可是，三年过去了，官司一审打到二审，二审再到重审，维权的路是那样的漫长，希望是那样的渺茫。好多时候，我都劝那些有理无力再打官司的人们放弃，所谓“君子维权，十年不晚”。我知道我的话是屁话，让那些弱勢的人特失望，但如果我鼓励他们抗争下去，那些人的一生将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所耗尽。

我只有两个同事可以出去采访，只有两个律师朋友提供义务法律服务，即使有一百个记者和律师也不够用啊！我常常想，法律是个好东西，但如果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利用法律和司法机制去剥夺和阻止穷人平等使用或逼迫他们使用法律的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欺负穷人的工具。怎样才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法啊，就像降妖除魔的宝剑，有权的和有钱的人都可以佩带，惟独穷人不能。假如有权的和有钱的人成为妖魔，穷人就只能千里迢迢来到中南海、紫

禁城。中南海啊紫禁城，里面有咱农民的大救星！农民上访说明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千万不能让农民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呀！

在北京和天津的高校中，很多学生都看过《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多次应邀到北京和天津的高校演讲，北京所有的高校我都去过了，人民大学我去了五次。我很高兴高校越来越多的学生关心三农问题。我很感谢中国改革杂志社的领导支持我和我的同事刘老石、邱建生同全国 73 所大学的三农社团建立联系。我们每年动员数以千计的学生参与“大学生回乡支农调查”活动，并为那些无钱回家的学生提供支农调查的路费。中国改革杂志社每年从调查报告中择优汇集出版两本《大学生调查报告集》，以供三农问题的研究机构和政策决策部门参考。我在高校中的朋友数以万计，源源不断地接到全国高校学生社团请我演讲的信函，如果全都成行，演讲可以安排大半年。过去的大学生，对三农问题是不屑一顾的，如今，三农问题在大学里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不仅如此，学生关心三农问题还落实到了行动上，北师大“农民之子”大学生社团组织为北京郊区的几十所民工子弟学校提供义务支教，几年如一日；人民大学“陶行知研究会”的同学，在全国几百所农村小学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教育既改变了乡村人民的生产生活质量，也改变了孩子的命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的同学，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全国的 100 个村庄提供长期服务；中国政法大学的“农民法律援助会”社团，坚持周六和周日接待上访的农民，为上访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南开大学“三农学社”和天津科大的“新希望”社团每年组织数百名学生深入农村和城市农民工居住区，宣传法律知识，为农民和农民工提供法律